

# 地方综合年鉴的叙事本位 及实感要求

刘善泳\*

**摘要** 我国以政区为单位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接脉于悠久的史志传统,特别注重叙事。由于年鉴编纂具有实时、实地特点,客观上要求叙事既有真实性,也要具备有血有肉、形神兼备的真实感。然而,由于沿袭以类系事的方志体例,地方综合年鉴叙事存在粗放化和碎片化问题,并与总结式、报告式的公文化风格互为表里,从而导致实感缺失,年度特色、地方特色淡化,进而影响年鉴质量。构建适应实感要求的年鉴叙事系统,可先从扩大单一性条目比例做起,并借鉴已有经验,不断提高条目叙事质量。同时,通过设立专题、专记等栏目,为叙事打开更大空间;利用图片的实景和实境优势,为读者提供更为直接的实感体验。着眼长远,应在宏观上进行更为系统的谋划,从结构、体例、成稿机制诸方面进行探索,实现叙事最优化。

**关键词** 综合年鉴 叙事 传统 实感 条目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总体目标。<sup>①</sup>截至202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已基本实现全覆盖的目标。如何深化地方综合年鉴性质、体例、方法诸方面的研究,提高其内在质量及文献价值,无疑是实现“年鉴全覆盖”后的重要课题。本文试以“叙事”为题,对地方综合年鉴的体例作一点新的思考。

## 一、叙事是地方综合年鉴的重要体例特征

通常认为,现代年鉴从西方历书系年鉴发展演变而来,19世纪中叶之后进入中国。而与今天所称的“地方综合年鉴”对应的较早年鉴,则出现在193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有第一部县级年鉴《无锡年鉴(1930)》和1935年上海市通志馆创编的《上海市年鉴》等。通过

\* 刘善泳,男,江西省石城县人,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方志学、地方史。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年8月25日。

中西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以政区为单位编纂的年鉴,即今天所称的地方综合年鉴,其面目完全不同于西方历书系年鉴,其编纂体例接脉于史志传统,注重叙事是其中的重要方面。<sup>①</sup>

记事和记言被认为是古代史官书写历史的两个方面,“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sup>②</sup>。两者之间,史家又更推崇记事,所谓“史书者,记事之言耳”<sup>③</sup>,又所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sup>④</sup>。较早出现的地方综合年鉴正是秉承了正史的记事传统,选择将叙事作为基本表达方式。首先,它们摒弃了西方历书系年鉴形如文摘的单篇体结构,而采用分门别类、自成体系的门目体结构。如《无锡年鉴(1930)》共设地理、人口、党务、政治、司法、警卫、财务、交通、建设、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卫生、公用、公益、宗教等17个门目;《上海市年鉴(1935)》设特载、大事概要、土地·人口、天时·气象、党务、行政、司法、外交、军事、财政、第一特区——公共租界、第二特区——法租界、金融、教育、交通、工业、劳工、商业、农林鱼牧、学艺、宗教、社会事业、时事日志、名人录等24个门目。这种结构明显借鉴于方志,并对应以类系事的编纂体例。其次,条目标题具有鲜明的叙事指向。《无锡年鉴(1930)》开篇的地理门第一个目即为《无锡地理沿革略史》,“沿革+略史”明确表明其记史、叙事取向。之后各门目则多以“概况”开篇,虽名“概况”,其实也是各个方面的“略史”。除了这种综述性门目,其他门目也有叙事意味明显的字眼,如“纪”(《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纪》)、“纪要”(《总工会纪要》)、“沿革”(《无锡地方自治之沿革》)、“记实”(《无锡县公安局甄别官警考试记实》)、“志略”(《京沪路无锡车站志略》)、“纪略”(《无锡县民众运动纪略》)、“记略”(《惠山公园改建经过记略》)、“历史”(《无锡医师协会概况·历史》)、“经过”(《筹备建筑中山大礼堂之经过》)。<sup>⑤</sup>《上海市年鉴(1935)》也是如此,大量条目或冠以“史略”“略史”“史迹”“大事记”“大事概要”“纪要”“汇志”“杂事”等史志性记事术语,或使用“沿革”“变迁”“经过”“进行”等反映事物动态的字眼。<sup>⑥</sup>最后,叙事是多数条目的主要内容。早期年鉴的大部分门目,除了那些标题就已“约定”叙事之外,其他门目也多充以叙事。如《无锡年鉴(1930)》之“交通”门,设路政、航政、电政、邮政、航空等5个部分,均以记述沿革开篇,下设数级条目,也多记述事物经过。叙事篇幅,则因事制宜,既有长篇,也有短制。长篇者如“党务”之《无锡党务概况》,以近9000字的篇幅,在总述之后,分秘密时代、初公开时代、清党时代、特别委员会时代、临时执监委员会时代、党务指导委员会时代、执监委员会时代等7个阶段进

① 刘善泳:《地方综合年鉴的基因谱系——以〈上海年鉴(1852)〉和〈上海市年鉴(1935)〉为例》,《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汉)班固:《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2000年,第1359页。

③ 刘知几撰,刘占召评注:《史通评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52页。

④ 刘知几撰,刘占召评注:《史通评注》,第177页。

⑤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图书馆:《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年,第15、17、45、71、123、300、335、309、198页。

⑥ 刘善泳:《地方综合年鉴的基因谱系——以〈上海年鉴(1852)〉和〈上海市年鉴(1935)〉为例》,《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2期。

行叙事,脉络清楚,过程周详。短制者如“警卫”之《无锡县禁娼概况》,从民国前的“画舫生涯”述起,到“开辟马路”后“另觅金屋,别筑香巢”,再到“公然悬牌营业”,最后至“上年内政部令取缔娼妓”后渐至“娼妓遂亦星散”,并于文末以议论方式提出“治本”之策。<sup>①</sup>虽然全文仅450字左右,但发展变化过程清晰,因果交代清楚,论从事出,颇有“太史公曰”之遗风。

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出版,在经历了1930年代的第一次高峰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新中国首轮修志的陆续展开,才再一次开展起来,并逐渐普及全国。新时期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和《无锡年鉴(1930)》《上海市年鉴(1935)》等早期年鉴一样,沿袭了我国的史志传统,叙事是其重要方面。并且,由于和修志活动关联极其紧密,从结构到内容,方志化倾向都非常明显,突出表现为体例上的以类系事。2006年5月,国务院颁行《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范畴,并将其表述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sup>②</sup>。将地方综合年鉴法定为“记述”行为,意味着“叙事”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应有之义。换言之,《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综合年鉴叙事体例进行了确认。这种确认虽然不能等同于学科概念,但对于人们认识年鉴和编纂年鉴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甚或可以说,人们就是根据这样的定位来认识、编纂和评价地方综合年鉴的。

## 二、叙事实感应成为衡量年鉴质量的重要尺度

承上所述,地方综合年鉴其实就是一个叙事系统,主要叙述一个地方、一个年度的事情。对于认识年鉴叙事,西方现代历史学部分观点具有启发意义。如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将叙事性话语结构分为编年、故事、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等几个层面。“历史领域中的要素通过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被组织成了编年史;随后编年史被组织成了故事”,故事“有着可辨认的开头、中间和结局”,并“被编排到一种意义等级之中”,共同构成“一个可理解的过程”。<sup>③</sup>其实,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历史书写,“年度”都是重要的时间单元。不管是海登·怀特的编年而成故事,还是我国编年记事的历史书写传统,都肯定了“年度”在叙事中的重要意义,说明年度是可以并应该被叙述的。这些理论资源,作为年度资料性文献的地方综合年鉴,既可借鉴融通为自身立足的理论依据,也可为其立身文献之林增强“道路自信”。

美国历史哲学家卡尔认为,“历史叙述体裁不仅是一种可能行之有效的描述事件的方式,叙述的结构实际上源于历史事件本身”<sup>④</sup>。法国哲学家、解释学家保罗·利科认为,“作为人们行动结果的历史事件因而像人的行动一样具有连贯性和序列性,也具有

①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图书馆:《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第78页。

②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

③ [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④ 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50页。

和叙述式文本结构相同的结构。所以叙述也是最适合表达它们的方式”<sup>①</sup>。根据他们的观点,叙事源于“作为人们行动结果的历史事件”,“源于历史事件本身”,是一种“最适合”的表达方式。地方综合年鉴记述特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其本质就是以“编年”的方式记述“作为人们行动结果的历史事件”,并最终进入“一种意义等级之中”。对地方综合年鉴来说,叙事即便不是“最适合表达它们的方式”,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事实上,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叙事更“适合”的方式。

不过,卡尔等人的观点同时提醒我们,叙事必须和事实本身相契合,即所谓的“文本结构”与历史事件的契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真实问题。本文之所以在“真实性”外提出“实感”一说,是因为年鉴叙事有着显著区别于历史叙事的地方。这种区别,主要体现为叙事的实时、实地特点。一个年度刚刚结束,资料收集和编纂工作随即开始,此所谓实时;年鉴的编纂和传播通常都是在当地的,此所谓实地。“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sup>②</sup>,实时、实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味,一是采撰方便,没有资料缺短之虞,二是编者和读者扮演在场者或准在场者角色,和事物较少隔膜。所谓实感,一方面要有真实性,要求所叙述的事情符合真实情况;另一方面要有真实感,要求叙事具体、完整,有血有肉,形神兼备,使“文本结构”和真实体验之间没有疏离感。

然而,实感的缺乏恰恰是地方综合年鉴叙事中较为普遍的问题,主要体现于叙事的粗放化和碎片化。为了表明问题的普遍性,以某部市级年鉴为例,其“法治·检察”共设概况、侦查监督、审查起诉、未检工作、公益诉讼、民事行政检察、刑事执行检察、刑事申诉检察、案件管理、司法警务、司法服务保障社会民生、司法文明建设、检察改革机制创新等13个条目,占11186字的版面篇幅,除去4张随文插图占2448字版面,文字为8738字。从所录标题可以看出,这些条目均为综合性条目。以“侦查监督”为例,该条目697字,开头60字左右记述此项工作的指导思想,然后依次记述全年全市受理审查逮捕案件、严惩黑恶势力犯罪、打击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犯罪、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惩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打击涉毒犯罪及侦查活动监督等10个方面的情况。该条目围绕“侦查监督”进行编写,内容全面、资料充实、信息量大,真实性应当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叙事角度看,这种一网打尽的记述方式所导致的结果,是所有事情几乎都是点到为止,均未得到完整叙述,没有任何一件事形成“有着一个可辨认的开端、中段和结局”的“故事”。因此,它们给包括编者在内的读者的感受,只是这一年做了这些方面的事,但没有一件事是有血有肉、具体可感的。与这种叙事方式互为表里的是总结式、报告式的公文化风格。这种没有实感的公文化叙事,必然导致年度特色、地方特色得不到彰显。就像有些综合年鉴全面、密集地记述该地区当年发生的事情,但读者既无法在宏观结构上直观感受该地区的

① 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第351页。

② (清)章学诚著,罗炳良译注:《文史通义》外篇《修志十议》,中华书局,2012年,第1323页。

大体风貌,深入字里行间也难以找到共同记忆——其图片的叙事色彩却很鲜明,此且另当别论。

粗放化、碎片化和公文化下的叙事实感缺失,伴生年度特色、地方特色的缺失,极大影响了地方综合年鉴的质量与价值,也影响人们对地方综合年鉴的认同。因此,走出“三化”迷局,追求有实感的叙事,应当成为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的共识,并以之作为衡量年鉴质量的重要尺度。

### 三、构建适应实感要求的地方综合年鉴叙事系统

探究地方综合年鉴叙事实感缺失的原因,有对其性质、定位的认识偏差,有借鉴志书体例时不合理地因袭,有操作层面上的贪图方便,不一而足。立足于需要和可能,应遵循由易而难的原则,逐步建立适应实感要求的地方综合年鉴叙事系统。

#### (一) 扩大单一性条目比例

条目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基本单元。在条目设置上存在分歧较大的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以综合性条目为主,一种主张以单一性条目为主,姑且分别称之为“综合派”和“单一派”。正如前文所例证的,正是综合性条目大包大揽的记述方式,造成了叙事实感的缺失。因此,构建适应实感需要的年鉴叙事方式,在大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最务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综合性条目,扩大单一性条目比例。下面以《上海年鉴(2019)》“法治·检察”为例,比较说明单一性条目在叙事方面的优势。

《上海年鉴》创编于1996年,各年度年鉴均以单一性条目为主。《上海年鉴(2019)》“法治·检察”全文15264字,共22个条目,除概况为综合性条目外,其他均为单一性条目。其中概况5186字,分块概括记述了2019年度检察工作各方面情况;其他21个单一性条目共计10078字,平均每个条目480字。单一性条目相对综合性条目,叙事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首先,事之眉目显于标题。除概况外,所有条目标题均为叙事性标题,一事一条,一目了然。一眼能够“看到”事,既是叙事实感的前提,也是具体体现。同时,因为因事设目,所以每一个目、每一件事都是唯一的、独特的,不至于出现年年相似、鉴鉴如斯的问题。其次,事之始末见于正文。因为事事独立,所以倒逼叙事的完整性,必然讲究脉络清晰,要素齐全,由此避免了粗放化、碎片化问题。单从字数上看,前面示例的综合性条目“侦查监督”697字记述了10个方面的情况,每个方面平均不到70个字。而平均480个字的单一性条目,都是叙述“一件事”。两相比较,后者的叙事空间显然非前者所可比拟。

#### (二) 着力提高条目叙事质量

单一性条目比例的扩大解决的是叙事的空间和载体问题,堪称重要的制度性设计。要使叙事更具实感,还是要落实于具体的条目编写。对此,早期年鉴和较为成熟的当代年鉴均有较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其一,重视记述事物因果。如《无锡年鉴(1930)》的《卫生·无锡临时时疫医院办理之经过》近4000字,用520余字叙述起因,从霍乱是“人类最可恐怖之一种传染病”这一时疫背景写起,接着简要比较“东西诸国”处理时疫的不同办

法,进而指出防疫实为“地方最大之慈善事业”。而无锡是人烟稠密的“沪宁之冲”,因此,“吾邑设立时疫医院尤为必要”,“设立时疫医院于疫病未发现之前”更是明智之策。<sup>①</sup>其二,注重述论结合。如《上海年鉴(2019)》“法治·检察”中的《沪东、沪西地区人民检察院获批设立》条目记述了设立沪东、沪西地区人民检察院后,评述因此形成“全市所有监狱及市监狱总医院、市强制医疗所由派出检察院统一承担派驻检察任务,检察分院、基层检察院只承担对辖区看守所派驻检察任务”的新机制,于是取得“从根本上解决监督主体不对等、派驻任务不均衡等问题,理顺派驻检察体制,提高监督质量和效果,有效推动全市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发展”的效果。<sup>②</sup>其实,不管是“事出有因”的因果揭示,还是画龙点睛式的“就事论事”,其实都是通过揭示事物“意义”,将特定叙事纳入“一种意义等级之中”,成为“人们所理解的过程”。如果说过程叙述反映的是事物的形,那么意义揭示反映的就是事物的神。只有形神兼备,事物才有活性,才有实感可言。

### (三)注重记事类图片的采编

相对于文字,图片具有“实景”和“实境”优势,为读者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感体验。大部分地方综合年鉴创编伊始,就借鉴首轮修志的经验,在卷前集中设置一定数量的彩页,以图片方式反映地方风貌或重要事件。如《深圳年鉴》2019年卷“年度图片新闻”栏目设立“‘一带一路’建设”“创新之都建设”“深港澳台合作”等专题,以多角度组图的方式反映叙事主题。特别是设立《深圳记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选取“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新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等16件历史大事,并配以图片,真实呈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深圳记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上海年鉴》也和众多年鉴一样,精心选择照片记录重要事件,反映事件现场,丰富叙事形态。特别是从2015年起在大事记后设《图录上海》专栏,立足百姓记忆和平民视角,指向社会变迁和民生冷暖,给人更具温度的实感体验。如2019年卷此专栏共用图42张,留存了上海百姓的年度乃至时代记忆。如“2018年4月15日,黄浦区面筋弄,老城厢最后一个公用传呼电话于3月底被停机,退休后在此干了近30年的贺阿婆再一次‘退休’”(图10),“2018年7月10日,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门前影片《我不是药神》的巨幅海报。7月5日该片上映后,屡创票房纪录,成为一部‘现象级’的年度大片,备受关注。”(图23)精选的图片,配以画龙点睛的图片说明,编者的选图意趣和叙事追求非常明显。

除了彩页部分集中刊录,随文插图也逐渐成为年鉴叙事的常用方式。所选图片或对应综合性条目相关内容,如《深圳年鉴(2019)》“人民团体·市科协”插图“2018年4月20日,第18届深圳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现场”对应于条目《大众科普与青少年科普教育》相关内容;或直接对应单一性条目所记事件,如《上海年鉴(2019)》“信息化·电信”条目《启动全国首个‘5G示范商务区’和‘5G+BK’试验网》,随文配图“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与上海

①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图书馆:《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第319页。

② 《上海年鉴》编辑部:《上海年鉴(2019)》,2019年,第162页。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共同启动全国首个‘5G 示范商务区’”；还有相当一部分插图独立于文字，所及事项条目未加记述，如前述《深圳年鉴(2019)》“法治·检察”随文插图4张(2018年4月26日，东帝汶共和国总检察长若瑟·希梅尔斯一行到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访问交流；2018年11月15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与市场质量监管委签订《关于加强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协作的工作方案》；2018年7月9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举行“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揭牌仪式；2018年12月28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举行第二届专家咨询委员聘任仪式)，其内容均未有条目涉及。《深圳年鉴》的插图主要都是此类一事一图的记事性插图，这也不失为对“综合派”叙事实感缺失的巧妙补救。

另外，通过设立专题、专记等栏目，记录、反映年度重大事件，有不少年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也为叙事打开了更大空间。如《上海年鉴》设置“要闻·大事”“特记”“专记”等栏目，集中记述年度大事、要事，彰显年度特色和上海风貌。

#### 四、结 语

我国史书的叙事传统已历两千多年，至今仍是史家常论常新的话题。而地方综合年鉴的出现即便追溯至1930年代，时间也不足百年，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不断探索的必要。地方综合年鉴的历史地位“总体上尚处于巩固提升阶段，尚处于从解决‘有没有’（数量）到‘好不好’（质量）的攻坚过渡阶段，远未到量多质优、百花齐放的成熟定型阶段，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当前总体上处于这一阶段，今后五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仍将处于这一阶段”<sup>①</sup>。假如“以史为鉴”确为地方综合年鉴的应然选择，假如叙事确为地方综合年鉴需要加强的方面，假如实感确为叙事之必然要求，那么，如何顺应“攻坚过渡”走向“成熟定型”要求在宏观上进行更为系统的谋划，如何破除大而全的框架让渡叙事空间，如何立足年度又不囿于年度，如何优化特色叙事栏目，如何在操作层面形成有利于叙事的成稿机制，包括如何借鉴史裁形成更为厚重的叙事风格，都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地方综合年鉴踵年而编，只要真正集众智、博众长，假以时日，其蝶变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冷晓玲 宿万涛

<sup>①</sup> 刘永强：《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方向》，《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2期。